

(上接A6版)

6 你们先走

如果说乐天酒店那边的人员还有点盼头的话,温德姆酒店这边大家的心态就会随着检测指标而波动,梁少文先烦躁起来,虽然自己没有什么症状,但检测指标一直不理想,他心急如焚的状态传染给了冷季轩,冷季轩也着急,想着最起码自己能早点入住乐天。

球队中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2003年的中场马钰均,其检测指标也高出奇,而且下降得很缓慢。他自己都无奈苦笑:要是按照这个速度,我今年还能回家吗?

在海外的日子是难熬的,对家乡的想念首先体现在了味觉上。乌兹别克斯坦饮食习惯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从入住赛区开始,国安代表团就几乎没有接触过中餐,这让大家一度肠胃上火。

后来,代表团发现在当地有一些中餐馆,而且提供外卖服务,他们选择了送餐到门,但为了减少接触,每周也只有一次,算是给大家改善伙食。

但吃到红烧肉的时候,球员想念家乡的心理又多了几分,肚子却不舒服了,有好几个人吃完后开始拉肚子。有人怀疑是不是新冠肺炎的腹泻症状,后来闻了闻,鼻子还能嗅到臭味,这才明白是肚子里没啥油水,突然吃了油腻,导致肠胃不适导致的。(注:球员们发现,新冠肺炎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是嗅觉丧失)

好在当时全队34个人都在一起,孤独感并不算强烈,在乐天的人员每天给温德姆的人员鼓劲,温德姆的两位工作人员也劝慰被隔离的13个人不要着急。为了让大家在两个酒店都不那么无聊寂寞,其间大家还都换过房间,适应一下新的环境,最起码从窗户往外看,不再总是同样的画面。

在整个代表团的互相陪伴下,四周还算较快地就过去了。

乐天酒店的人员及温德姆这边被认为有可能能够拿到绿码的一共19人向大使馆申请了绿码。

在申请绿码的前一天,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一起开了一个会,议题就是确定一下绿码申请下来后如何分批回国。

在这之前大家都急着回国,但当面临选择的时候,反而没有人出来急于挤上这第一趟航班。

“我留下来,你们先走。”作为代表团领队的杨璞率先表态。这位球员时期曾经担任过国安队长的领导者,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虽然杨璞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骨子里还是有北京爷们儿的那种责任感。

杨璞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代表团第一负责人,是领队,而且还是职业球员出身,退役后搞青训,这批预备队的孩子很多都是他看着长起来的,他留下来能够有稳定军心的作用。

但最后通过开会讨论决定,杨璞率第一批可回国人员先走。原因是,第一批回国人员应该是人数最多的,他们也需要一个领导者,作为第一负责人的杨璞,带最多的人走是应该的。第二个原因,杨璞作为第一负责人,需要在回国后将此次亚冠经历全程向俱乐部及周金辉董事长做一个汇报,并将在塔什干滞留人员所需要的一切援助提出来,这样对后续人员的归国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原因,杨璞虽然有外语交流的能力,但并不是代表团中外语最好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是需要外语更好的同事来处理善后事宜。

杨璞不想当孩子们眼中的“逃兵”,但会议中大家的讨论结果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璞并不是“逃兵”,而是要去“求救”的那个人,他肩膀上的责任并不轻松。

大使馆的绿码批下来17个,但俱乐部方面从航空公司只拿到了15张机票,当时滞留塔什干要回国的华人太多,正常渠道下只能拿到这么多票。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不想放弃,大家开会筛选出可能会被留下来的两个人,一个工作人员和一个球员段德智。主要是因为他俩在过往检测时曾经出现过指标偏高的问题,担心一旦入境后再检测出问题,反而得不偿失,并且会给后续归国人员造成困扰。但他俩同样收拾了行李,同样去了机场,抱着万一的希望,如果能有退票的,就走一个是一个。

可是希望落空了。

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神情落寞地回到了乐天酒店,大家安抚了他们两个人,一起留在塔什干。

临走前,杨璞向继续驻留的人员提出一个



建议,所有人都从温德姆酒店搬到乐天酒店来,“放弃”温德姆。

杨璞认为,乐天酒店的防疫意识明显强于温德姆,而且让大家换个酒店,换个环境,对心情也是一种调剂。而且,乐天酒店的伙食更适合东方人,最起码米饭、面条这些东方口味的食物可以满足滞留人员的基本要求。此外,酒店还有个健身房可以供球员们进行日常的身体训练。

8月19日,第一批国安代表团成员回国,剩下的滞留人员共19人搬到了乐天酒店,他们就只能等待8月26日的航班。这次,国安代表团滞留人员再次向大使馆申请绿码,除了已经拿到绿码的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外,大使馆又批下来6个绿码。但是俱乐部方面仍然没有拿到足够多的机票,只有4张。

这4张票给了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另外两人是谢龙飞和梁少文。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入境到了机场,又出了问题。

7 “无期徒刑”

其中一名国安人员在入境的检测中又发现指标偏高,被拉到医院进行采样检查,后来在其样本中发现了核酸呈阳性。

而不巧的是,这个阳性成为了8月26日这趟航班中第五个检查出呈阳性的病例。根据民航方面的防疫要求,航班发现超过(含)5例阳性感染者,就要熔断。

本来,这趟航班之后,在9月初还有一次航班,随后才开始熔断。周金辉董事长也希望趁着这9月份的最后一次机会,让全员都一次性回国。在这个过程中,周董也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希望能够达成俱乐部的请求。

而另一方面,在塔什干剩下的15个人也都打点好了行装,将希望寄托在这9月份的最后一次航班上,大家甚至都已经离开了酒店,前往机场等待,归国之心可见一斑。

然而,最终15个人心灰意冷地又回到了乐天酒店,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周董在内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更糟糕的消息随后接踵而至。9月份的航班熔断了,接着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文件,短时间内不再审批入境绿码。这让滞留在塔什干的国安人员情绪陷入了冰点。“无期徒刑”的痛苦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何时能够解脱。

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如果是34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恐怕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孤独和恐慌,而当有一部分人离开的时候,剩下的人所承受的煎熬其实是会加倍呈现的。航班再次熔断,也就意味着至少要再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先期归国的杨璞已经向俱乐部汇报了情况。周金辉董事长非常重视,责令总经理李明和俱乐部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尽快将滞留的国安俱乐部人员接回国。同时,周董明确同意了包机的申请,目的就是让滞留的国安人员早点回家。

但包机方案的申请和审批,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失望是肯定的,但生活还要继续。滞留的人员一边向我国大使馆咨询情况,一方面互相开导。工作人员主动过问球员们的状态,小球员们也很懂事,反过来也会安慰工作人员不要太辛苦。有球员说,这个时候真的能够感觉到团队的重要。

只要坚持,好消息迟早会来。

过了“十一”国庆,大使馆开始放开绿码申请,航班再一次复航的时间定在10月14日。

而且,那段时间中国国家队的12强赛开始了,滞留人员能够有球看,对他们的生活也是一个很大的调剂。

这个时候,滞留人员又出现了新麻烦,大家的签证过期了,代表团滞留人员中的工作人员又跟大使馆多次交涉,使馆方面答应可以帮助签证问题,但是可能无法赶上14日的航班。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15个人盼望着能够乘上在10月28日的航班飞回北京,飞回自己的家中。但这一次,俱乐部方面只弄到了五张票。周董在后方的努力,滞留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的沟通,滞留球员互相的隐忍,这些到最后都被航空公司打了个“三折”。

没办法“能走一个是一个”,塔什干这边,冷季轩做好了准备,他跟着五个拿到机票的队友一起去了机场。巧合的是,球场上的“机会主义前锋”冷季轩很幸运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在机场等到了一张退票。

可就是这个第三批归国人员里,又出现了麻烦事。在入境检测时胡嘉祺又遭遇到了跟之前队友相似的情况。

8 最后九人

在西安入境的胡嘉祺被检测出呈阳性,这个消息传到了俱乐部,俱乐部方面跟滞留团队进行了沟通,觉得这完全不可能。此前,胡嘉祺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但入境检验却非常严格,将胡嘉祺拉到了医院,并且要对其进行“治疗”。这可吓坏了胡嘉祺,因为运动员用药必须非常谨慎,弄不好会造成不良后果。俱乐部方面马上联系人员前往沟通,胡嘉祺的家长也出面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强烈要求胡嘉祺入院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避免出现入境检测可能会出现误差。

果然,胡嘉祺的再次检测平安无事。但入境方面仍然将胡嘉祺列为“无症状者”。“无症状”在民航防疫规定中,也是五个熔断指标之一。

在此前10月14日的航班中就出现了五名阳性,这一下航班又熔断了。

此时,滞留塔什干的国安人员,还有九个人。对于这九个人来说,他们近乎崩溃。

航班要想恢复还要再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而即便恢复了,根据此前的情况,俱乐部也不一定能够拿到足够的机票,万一再留下一批,而航班又熔断一个月的话,那恐怕最后的人可能要在塔什干过年了。

而且,国内的疫情自从“十一”国庆过后明显紧张起来,随着天气转凉,各地都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

天气转凉,塔什干的气温一天比一天低,留下的九个人他们背包里都还是6、7月份的短袖,没有御寒衣物是他们面临的首先要问题。

在滞留的九个人中,有四名工作人员和五名球员,这四名工作人员便四处采购御寒物品,终于买到了足够的棉服。

由于有了胡嘉祺的前车之鉴,滞留人员非常重视环境消杀,消毒液和洗手液都随身携带,球员们去健身房训练,都会把健身房的器材喷洒消毒液,回到房间后再向身上喷洒一遍。

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最早的一班民航是12月初,而这趟航班能不能回国,剩下的九个人心里都没有谱。剩下的人越少,心里越慌。万一最

后就剩下一两个人留在塔什干,可怎么办?

压力越来越大,有的小球员开始焦虑,出现了失眠的症状。九个人只能互相安慰,互相打气。工作人员与国内俱乐部的教练和领导进行了沟通,同意给大家做出了人性化的处理,毕竟这个时候球员的身心健康同样重要。管理团队规定,五名球员每天的基本训练可以不打卡,绝对不可以抽烟,但可以少量饮酒,或者吃一些喜欢的食品,不强令要求球员限制高热量饮食。不过球员们很自觉,每天训练仍旧按照要求完成,一支烟也没有抽,饮食方面也尽量控制,只是偶尔吃顿涮肉来解解馋。

而这个时候,国内的队友和同事也没有忘记他们,九个滞留人员会经常接到国内队友和同事打来的视频通话,大家聊会几天,扯会儿淡,也是一种很好的倾诉方式。

面对这种滞留的情况,球员的家长急眼了,他们开始不断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反映,足协、体育局、外交部能找的地方,球员家长们都找遍了。

9 从天而降

这个时候,周金辉董事长要求的包机,审批下来了。

包机的申请兜兜转转,经过有关部门几个月的审批,在球员家长们不断的压力下,终于完成了。尽管这个包机姗姗来迟,尽管这个包机比航班也就早了半个月,尽管这次包机花费了几十万——这对于目前财务非常紧张的国安来说,已经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了。

但周董仍然坚持,用包机把剩下的九个国安滞留人员一次性接回家,这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责任的问题。

在这最后的这几个月里,四个工作人员和五名球员已经不分你我,大家成为了一个患难与共的团体。

当包机降落在北京的时候,九个人的心态终于平稳了,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或多或少有些湿润。而不同的是,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希望和遗憾。

之于希望,五名球员希望尽快恢复训练,跟上队友们的步伐,早点进入一队。四个工作人员希望早点结束隔离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和孩子,然后继续开始自己的工作。

之于遗憾,五名球员都想着如果同联城的比赛能够拿着4分回家,至少也是这几个月以来的一种安慰。而四名工作人员中,有人遗憾他的父亲做心脏手术的时候,自己不在身边;还有人遗憾他再也见不到自己家里两位祖辈老人……

157天,34名国安球员和工作人员,应该被记住。

(本文节选自《北京主场》)

